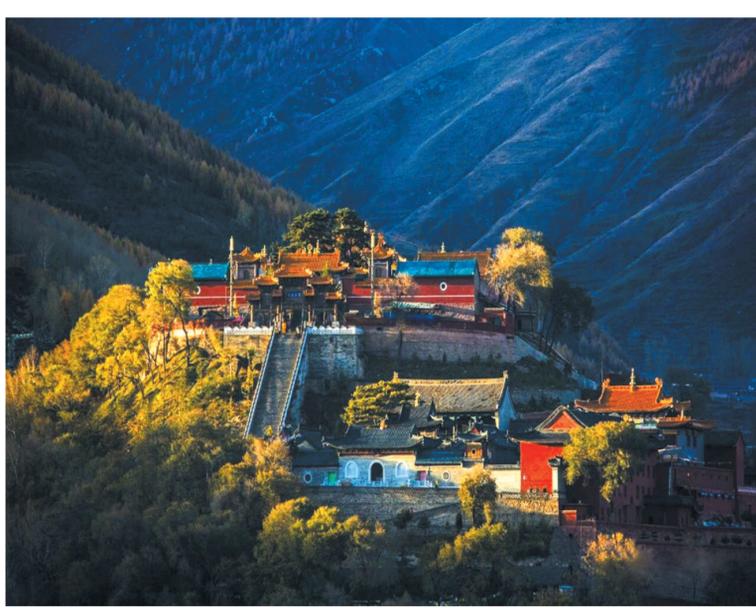


忻州史话

五台山上的红色记忆



菩萨顶 刘永平 摄

随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五台山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当1937年的炮火打破晨钟暮鼓的生活，这个千年佛教圣地，在抗战烽火中化作了革命的摇篮：八路军总部曾在此运筹帷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此救死扶伤，就连僧人也脱下袈裟投身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指挥部队奔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朱德、左权亲自到南茹村选定八路军总部驻地，他们认为这里四面高山环抱，中间平坦开阔，交通方便，可防可攻。八路军总部进驻南茹村后，在平型关取得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紧接着又连续指挥了切断敌人雁门关交通运输线及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9月底，八路军总部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全面部署了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要求各部队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成立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0月，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和战场形势发展，在南茹村驻扎36天的八路军总部告别南茹，转战太行。

八路军总部转移后，党中央决定派聂荣臻率军在五台山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彼时的五台山地区，在日军占领太原后四面受敌。国民党政府形同虚设，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聂荣臻在当地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兵分多路开辟根据地。由于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且政策深得民心，所以很快就站稳了脚跟。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

五台山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后，他率领部队抵达台怀镇，驻扎在当地开展抗日活动。

聂荣臻领导五台山100余名僧侣组成抗日队伍，积极为战争捐物、捐粮、提供住处、传递情报、救治伤员等，使五台山成为当时僧民共同抗日的基地。1938年，聂荣臻率领军队多次在五台山周围与日军交战。以滑石片战斗最为著名，经过与敌奋力激战，全歼日军5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

1938年，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聂荣臻聘请他为卫生顾问，帮助救治伤员。彼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医疗器械供应非常困难，白求恩便组织当地木匠制作各种医疗用具，及时解决了很多问题。为了大力改进战场伤员救治工作，培养更多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医疗水平，白求恩提出抗日根据地应该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医院，于是亲自倡导设计，将一个设备简陋的医疗所改建成一个配备手术室、消毒室、医务室、洗涤室的外科病室，被大家誉为“白求恩模范病室”。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战士做手术时，因左手手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晋察冀边区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题挽词并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共产党员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此，白求恩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1969年，中共五台县委、五台县人民政府在五台县松岩口村建成白求恩纪念馆。1982年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

□高峰毅 高鹏昊

被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48年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经崞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抵达五台山台怀镇，路居于塔院寺方丈院。彼时，雪后初晴，碧空万里，五台山佛教圣地沐浴在朝晖之中，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典雅壮观。在地方干部和老方丈陪同下，他们游览了塔院寺的大慈延寿宝殿、大藏经阁。从塔院寺出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陪同人员边走边走进罗睺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开花现佛”，还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僧侣的生活情况，指示陪同的地方干部要抓紧寺院的修复和保护工作。离开罗睺寺，他们又进入显通寺参观无量殿和铜殿，之后向钟楼走去。楼内悬挂着一口比人还高的大铜钟，众人品读着钟上铸刻的经文，不时向老方丈请教。

出了显通寺，大家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菩萨顶。随后返回五爷庙，进入五龙王殿。老方丈介绍道：“五龙王殿建于清代，殿内主供五龙王，俗称‘五爷’，所以五龙王殿又称‘五爷庙’。传说五爷最爱看戏，对面那座戏台就是专为给五爷唱戏而修建的。清代以来，五台山每年要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庙会，其间这里要唱一个月的戏。”时值中午，周恩来抬头看了看天色，与毛泽东商议得赶快下山，午饭后还要动身前往西柏坡。在塔院寺吃过午饭，毛泽东一行告别老僧启程出发。队伍沿清水河南下，经石咀镇，折北转东，过长城岭，出龙泉关，进入河北境内。5月底，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胜利完成了中央机关的伟大战略转移。

《抗敌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党报，于1937年在五台山地区试办，1938年4月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成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晋察冀日报》伴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见证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党报之一。办报期间，面对敌人层层封锁和恶劣环境，《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泛的消息源，巧妙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获取消息、出版报纸，像地雷战英雄李勇、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等的事迹都是在那段时间刊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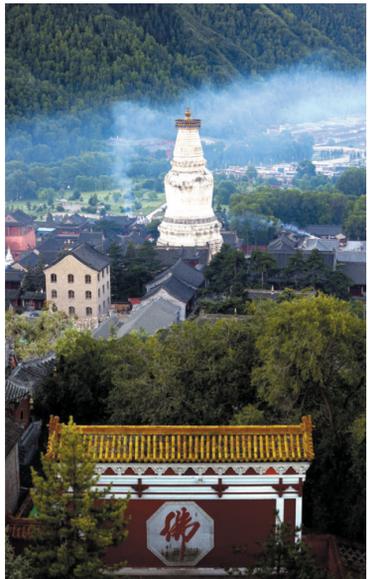
《晋察冀日报》内容丰富多样，形式多样，既有国内外新闻、副刊散文，又有漫画、顺口溜、诗歌等，不仅在解放区出版发行，还在敌占区发行。由于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幽默诙谐、脍炙人口，成为当时根据地广大军民了解八路军政策和根据地战况的主要渠道，也是党和人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

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银行。抗日战争初期，大部分抗日根据地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其造成的后果有：抗日根据地许多物资被国民政府用法币套购，导致根据地物资紧缺，经济停滞，社会不稳定；随着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法币严重贬值，面值增大，流通不便，影响到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此外，市面还流通其他省的地方流通券和各县自制的土票，造成财政经济十分混乱，严重扰乱了根据地金融秩序和商业贸易，助长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1938年初，为了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发展边区经济，打击敌人掠夺，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设立边区银行。1938年2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正式成立，3月20日在五台山普济寺内开始营业，直到1948年7月，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边区银行的钞票发行后，清除了地方发行的各种钞票，统一了边区的货币市场，同时在山西、河北以及辽宁西部、内蒙古、山东德州地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流通，流通人口达3000多万人，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支持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

今天，当人们循着这些红色记忆登上五台山，松风如涛，塔影无言，却仿佛仍在复述那段烽火岁月。每一抔尘土都浸透先辈热血，每一道山脊都雕刻民族意志。历史并未远去，它化作庙檐的风铃，催人们自省；化作台顶的朝阳，召大家奋进。让我们把五台山的红色记忆郑重装入背包，不只是缅怀，更是出发——在新时代征程里，胸怀信仰，肩扛担当，当春花再次开遍山野，那一片片鲜艳将是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回答：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



五台山 杨国军 摄

评论天地

读作家柳青的《在旷野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这部小说非同寻常地吻合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氛围、自然风貌、人物情感以及当时星星点点的细节真实。尽管早就接触过这位作家的作品，但这次进一步认识到：柳青是一位真正忠于时代、忠于现实生活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作家。他的作品始终与时代的发展相映照，无愧是一幅幅历史进程最可信的“真实底片”。

在这点上，我还有资格为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作证。尽管他在陕西，我在山东，但这并不妨碍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事，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相当程度上打破或是避开了那个历史时间段惯常使用的二元对立的描写方式，展现出事物和人物正当的复杂性、多面性。主要人物朱明山性格丰满，为人正直而富有公心，作风淳朴而好学，但他也有自己的“内心生活”，其中占重要部分的是与妻子高生兰在时代变迁中逐渐产生的意识分歧。这种内心的冲撞感几乎贯穿全书，读来十分真实且合乎逻辑，并非刻意掺入的“添加剂”。县长梁斌这个人物，比起朱明山，虽然着墨少些，但并没有脸谱化，作者节制使用剑拔弩张和粗放式的语言来描写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此书篇幅不长，围绕展开的事件有限，读来却艺术相当丰富，思想和艺术境界非常开阔，能体味到作者的时代意识和对社会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如书中描写人物语言和行动时多次涉及抗美援朝等话题，那是因为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及其结果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时代脉搏”与“作家责任”密不可分，我始终觉得柳青是一位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者与作家责任的自觉体现者，这二者的恰当融合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在旷野里》，增强了这个小长篇的宽度和厚度。

本书在艺术表现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可圈可点之处也不可忽略。柳青作品的艺术表现丰富而不冗杂，精到而不板滞，其语言流畅而富有韵味，简练而极具动感。他受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不言而喻，诗意的抒情中又有具象，细节刻画中又不至于乏味。在抒情和叙事中猝不及防地展现“柳青风格”的精当评价，令人不仅不觉得多余，反而收到画龙点睛之效。即使是调侃，也是柳青式的揶揄和升华，而无丝毫油滑意味。他所拥有的词语资源也非同一般的丰厚，常慎择而用之。尤其是在动词和形容词上，往往不甘俗套且信手拈来，如：因为肠胃病“跌”进医院，好几个月“爬”不出来，他的思维像一个“摇动的指南针”一样晃悠着，“拥”在他面前很多的笑脸，等等。这些或清简或繁复的描写，皆随当时气氛和人物感情状态而变换，各有雅俗不同的表现力。

纵观柳青的作品，他的艺术风格和语言文字是不断趋于成熟和练达的。这说明他是一位非常用功并永葆前进态势的作家，他的脚步始终奔走在旷野上……

在旷野里行进

□石英



文人雅事

花前品茗有提炉

□孟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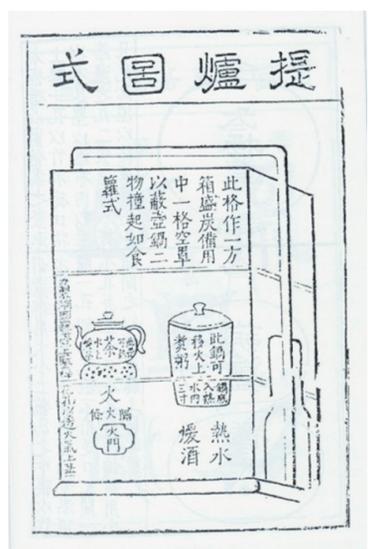
古代士大夫最重悠游山水，如何让游山观水惬意舒适，就成了他们兴致勃勃长期钻研的课题。明代人发明出一款“提炉”，让文人雅士身处山野，于花下小坐时，也可以品一盏茗茶，喝一杯美酒。

明代戏曲家高濂撰写的《遵生八笺》，可谓士大夫精致生活的指导书，书中详细介绍了提炉的形制与结构，还附上插图。书云：“式如提盒，亦余制也。高一尺八寸，阔一尺，长一尺二寸，作三撞。下层一格，如方便，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注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小铍有盖，顿汤中煮酒。长日午余，此铍

可煮粥供客。傍凿一小孔，出灰进风。其壶铍迥出炉格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便壶铍不外见也。一虚一实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盖以炭袋，总三格成一架，上可酌茶，与提盒作一副也。”

根据文字与插图可以看出，提炉的灵感来自当时普遍使用的“三撞”，即三层式提盒，由可以灵活组装或拆卸的几部分组成，包括一个带有底座的提梁架、两层方匣盒、一个四方形围框，以及一只铜质四角的水火炉。两层匣盒与四方形围框在外径上尺寸一致，且彼此采用子母口套合，可以按照一层匣盒在下、四方形围框在中、一层匣盒在上的形式叠置，并依靠子母口嵌合牢固。下层方匣盒的外径尺寸要与提梁架底座上的浅凹槽正好相当，这样在移动过程中，匣盒就能牢固嵌置在底座的凹槽内，不会脱落。

整套配置中最重要的组件是一只小铜火炉，这只铜炉亦为四方形，外径与下层匣盒的内径相当，可以恰好放置在匣内，不会晃动。此炉之所以名为“水火炉”，是因为炉体的内部用铜板隔为左右两个用途不同的区域，分别发挥着水风炉与烫酒器的



《遵生八笺》里的提炉

功能。左半部的顶部安有圆形灶，可以放入炭火，在其侧壁上则开有火门，用以通风、清灰，因此只要将特制的茶壶置于灶上，就可以随时生火煮水，冲茶品茗；右半部则仅在顶部开有一个圆口，使用的时候通过圆口向内注入热水，然后把一只与圆口大小相配的带盖小桶放入其中，再把酒注入小桶，将酒烫热。小桶是为了组合方便精心设计的，还可以担

任袖煮粥的角色，故《遵生八笺》中称其为“小铍”。游玩中肚子饿时，还可以随时把这只小桶放到灶口上，煮粥或者其他便于快速制作的饮食，就地来一顿野餐。

出发前的组合程序是这样的：先把小铜炉放入底匣盒当中，将底匣盒嵌置在提梁架底座上的浅槽里。然后将特别配置的小茶壶插入灶眼，把带盖小桶插入注水孔，这一壶一桶皆经精心设计，底部的一部分能够深嵌到灶眼、注水孔之内，由此安稳直立，不动不摇，于是将小炉作为了置物架。接下来将四方形围框套叠在底层匣盒之上，把插立在炉顶的小壶、小桶罩合起来，最后以上层匣盒叠置于四方形围框之上。上层匣盒用于盛放铜炉所需的木炭，盒口以一面罩盖加以闭覆，按照当时流行的提盒形式，在罩盖与提梁之间装设插栓。只要自提梁上将栓销向下插入罩盖内，三层盒、框便牢牢地嵌合成一体，固定在提梁架内。如此，便可以很方便地携带提炉外出，绝无安全之虞。使用时只需拔开栓销，将三层套叠的木匣拆散，自底盒内取出小炉。就凭这只小小的铜水火炉，出游之人可以随时对着青山绿水煮酒畅饮，在花前柳下以香茶遣兴。

近年来，野外露营和自驾游流行，户外露营用具也随之丰富起来，包括各种露营炊具套装。也许可以将明代提炉加以现代化翻新，制成一只便携式茗饮匣，下层安设以电池加热的咖啡机、袖珍炉，中层放置咖啡具与茶具，上层装盛咖啡茶叶与甜点，让人们出游期间可以随时动手调配一些适口茶点。

画说



邵继善 作